

散文与时代

□古 耜

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代自有深植于这个时代全部社会和文化土壤的标志性的文学样式。譬如:汉代有赋,唐代有诗,宋代有词,元代有杂剧,明清两代则有白话小说。文学进入现代中国,小说特有的以故事性和再现性见长的功能优势,明显对应了这个时代相继出现的启蒙、救亡、革命和娱乐的需求,因而它一路走来,风光无限,历久不衰,成为毫无悬念和争议的“第一文学样式”。

然而,大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向波澜不惊,安于边缘的散文随笔,突然爆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先是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接下来思想随笔、性灵小品、书话杂谈,以及新散文、后散文、轻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等,旗帜翻飞,竞相登场,且各有实绩与可观。一时间,散文随笔作家的阵容空前壮大,而一批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学者、表演艺术家、画家乃至官员,亦纷纷加盟其间,频频捧出佳作。于是,“太阳朝着散文笑”,一种昔日鲜见的“散文热”,赫然呈现于文坛。对于散文随笔的这一番时来运转,尽管有学者一再做出“消歇”、“退潮”、“强弩之末”之类的预测,然而,事实却没有为这种预测提供任何支撑与佐证,相反,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散文热凭借网络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和多种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凭借散文随笔作家的不断探索、深入总结和自觉扬弃,最终形成了以精英写作为引领,以大众参与为特征的更加蓬勃向上、蔚为大观,当然也更加健康合理、前景无限的创作局面。

时至今日,散文随笔创作的风生水起,方兴未艾,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已有敏感的学界乃至使用了“散文时代”或“散文时代”的命名。窃以为,这多少有些仓促和草率。而换一种更为稳妥和准确的表述庶几是:当下中国的社会条件与精神生态比较适合散文随笔的生成与发展;或者说,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特质、内涵和需求,呼唤着散文随笔的光顾与传达。关于这点,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和理解。

第一,深刻的时代变革与急剧的社会转型,丰富了散文随笔的素材基础和灵感来源。如果借用黄仁宇“大历史”的观点来审视当今中国,那么应当承认,它正将肇始于近现代的历史大变局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即古老的中

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蜕变与急剧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呼啸前行的时代车轮不断孕育着新鲜事物、奇崛场景与陌生话题,同时也不断传递出行进中的缺陷、失误与阵痛。而所有这些对于立足时代前沿,以迅速捕捉和表现生活新质与新变见长的散文随笔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召唤,更是一种机遇。为此,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创作,力求真实、深入、立体多面地书写现实,于是,文坛不仅收获了一大批打上了时代印记、闪耀着现代意识的散文随笔作品,而且生成了“跨文体”、“非虚构”、“新写实”等新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路径。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优秀的散文随笔作家同样可以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而他们笔下的文字则不啻于最为鲜活的社会长镜头与历史备忘录。

第二,碎片化的精神图谱与情绪节奏,对应着散文随笔即兴式的书写方式。真正的历史变革往往是全方位的,它不仅足以引发生活情境和社会风习的兴衰更替,而且必然带来人的观念世界的大破大立,革故鼎新。而经历着观念变革与扬弃的人们,在冲破了旧有束缚之后,由于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新的精神坐标与思维图式,所以无论认知还是感情,都难免流露出每时每可见的个别性、偶然性、跳跃性、爆发性、随机性,直至冲突性和断裂性,即内心世界处于一种碎片化状态。如果把这样的心态置于文学创作的语境,我们不难发现,与之构成深层对应的文体显然不是小说、戏剧乃至诗歌,而是同样具有极大开放性和自由性的散文随笔。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散文随笔所具有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和适应了现代人所需要且习惯的东鳞西爪、吉光片羽但又又不乏革新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表达。关于这点,近年来所谓笔记体、语录体、微博体等等,频现乃至走俏于散文随笔领域,或可作为某种印证。明白了这点,我们即可更懂得周作人当年为何要说小品文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时代”。其实,对于社会和民族的进步而言,心灵的涅槃与重生较之散文随笔的兴盛,无疑更值得珍视。

第三,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内心焦虑,期待着散文随笔提供充足有效的心灵沟通与情感慰藉。现代社会物质膨胀而又竞争激烈,利益多元而又变数迭见,这使得许许多多的现代人在

理论与争鸣/新闻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学术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文学科的学科化建设得到空前展开,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虽然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国际先进国家所达到的高度还有相当距离,但以自己的纵向历史相比,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

成绩虽然是主要的,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来,人们对某些专家水平、学术著作、学术成果的抱怨越来越多,学术体制不尽合理的问题也被反映出来,学术失范、剽窃、造假等不端行为也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种打着“纯学术”之名的“假、长、空”写作,蔓延着招摇过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就是在学风与文风上的一种技术主义。在技术主义者的眼里,构成一篇论文的技术因素是至上的,原始资料、规范、数据、工具、参考文献等是主要的,而思想、价值、评价等是主观的,所以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因为后者因人而异,所有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无所谓美丑之分,甚至无所谓对错之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论文生产越来越多,但同一问题的评价、辨析、辩驳却越来越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没有随着阅读论文的增加而深化或提高。

换言之,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站在当下现实关系基对话,不愿意讨论,不愿意说服,而愿意对着数字、文献资料、某一公案自我演练,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即使论题集中或同一主题的技术讨论会,人们也心安理得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选题重复没有关系,只要有新材料即可;有新材料得不出任何新结论也没有关系,操练这些材料符合规范文意即可,这就形成了“新材料”崇拜。虽然人们不愿意思想交锋,但“你说东来我偏西”的故作分歧,低水平的偏执一端、“片面的深刻”却不少见。这种情况下,知识循环无法良性运行,认识分歧依然故我,对话依然是一种发泄式的抱怨。如果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放弃了“以理服人”的率先垂范,那么整个社会的跟进逻辑会更加混乱,或者充满怨气、怨气与戾气。

缺乏在历史与现实结合处的理论展开,放弃将人们的认识提高一步的升华努力,更不用说那些娱乐化的“揭秘”学术了,它们以贩卖噱头为主,巧辞伪饰,使历史与人物本来面目颠倒,是非不分,他们的众声合唱,产生了众多的效仿者,遂使越来越多的论文成为学术体制或强势媒体市场的产物,而不是思想成果、精神创造的产物,不是价值确认妍媸分明的产物,不是审美升华的产物。

在研究生教育中,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指导教师也往往重点要求学生学习规范,甚至将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选取一个问题展开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研究问题的价值性让位于研究问题的操作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细小事局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偏执到摸着大象的鼻子论证大象是一条蛇的诡辩,比比皆是。其实,学生学习人文科学的论文写作,人文目的与工具手段不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放弃人文——目的的定位的工具——技术演练,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优秀的学位论文和优秀毕业生,也难以造就合格的创造性人才。目前,我国的研究生人才教育,从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领先者,而教育的质量,亟需提高的内容包括论文写作的质量。显然,论文只是符合一系列的技术和操作规范,这是一个很低的要求,不符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标准。而对他们的论文放低要求,就难免有制造学术垃圾的指责。

惟技术规范是求的做法,甚至到了自以为是、津津乐道的地步,这种学风与文风,有时含有炫技的成分。何为受过专业训练?在有些人看来,就是会使用一系列的工具体,论文中有似新非新的论据排列和魔方般的组合,有常人难见的异新说辞,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和丰富的外文征引,等等,但没有有价值的思想、没有情到深处的人文关怀、没有抓住根本的彻底。这种学风和文风,越来越像声名狼藉的商业大片,在“大投资大回报”观念影响下的技术主义思维——过分追求影片的技术表现和视觉冲击力,而忽视对电影本身内容的创作。

技术主义的奴隶,导致了“揭秘”文化的流行,甚至在一些著名文化学者中也有所难免。撷取某个历史片段,在文献断裂处虚构因果关系,虚构是非恩怨,由此窥见自己所设定的人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从而形成所谓的“揭秘”文化。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近年来的各种揭秘现象,大多数所谓的揭秘,不过是炒冷饭,不过是故弄玄虚,不过是矫情的反弹琵琶,不过是故意“反着讲”的颠倒是非。这加重了当前的学术浮躁情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偏执思维,孜孜以求个别细节的面面俱到,在罅隙处深文周纳,大费周章,得出惊人视听的结论,《走向》一书的出版,其意义或许就在此。

学术与人文不能分裂

□孙伟科

但却丧失了对整个画面的准确把握,这助长了诡辩作风的流行和相对主义的亦是亦非。比如,地球是圆的,但他们却指着机场跑道说,地球是直线的,并且用这个“细节”进行反科学的诡辩。在社会文化方面,这加重了社会上“流言”文化对严肃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解构,以至于学校对于儿童的历史文化教育失效,学生要经常回家问父母:这是真的吗?

从社会形成和管理层面看,迷恋技术主义,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学者专家没有形成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研究的经费、研究规划完全依赖少数政府部门,而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不仅浪费了专家的学术生命,而且给整个学术乃至未来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技术主义高涨的年代,专家以能够亲近决策者为荣,甚至以能够跻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感到自豪,丝毫没有意识到科学发展的独立性,没有提出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意见。少数专家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将自己对某些行业发展的看法提供给少数决策者,而少数决策者的支持导致中国在某些行业领域资金投入密集,甚至出现大量的浪费现象,而其他绝大部分领域却由于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逐渐衰落。

推崇技术至上,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导致了如下分裂。

第一是学术与人文的分裂。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其任务具有二重性,既关乎学科对象本身,又关乎现实人心;或者说研究对象在二者的结合部。技术主义将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学科历史甚至是学科悬案中,将问题固化在历史的牢笼中,其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行为。崇尚技术至上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这就是人们所厌恶的“假长空”现象。学术与人文的分裂,导致了人文与学术的本末倒置,也导致了学者社会地位的危机。他们的劳动被认为是攫取名利的手段,虽“著作等身”但却无法赢得应有的社会尊重。

第二是学与术的分裂。这导致有术无学现象的产生,即一个写出了上百篇学术论文的人,评了教授、研究员,成为专家学者,但是却不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文化修养的人,隔行如隔山,甚至对相近相邻领域的研究也一无所知。技术至上的观念妨碍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学术大师当然也就难产生了。真正的学术大师往往在是能够将知识、现实、人生相互贯通的学者,是能够将传统与现代一体化的继往开来者,是能够运用适当策略将理想转化为策动现实力量的人;而技术主义者对大师却少有尊敬,在他们看来,知识的总体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往往通过技术细节发现大师的个别弊端,进而否定大师的价值,并认为大师是“个人崇拜”和精神迷信的产物。这真正应验了那句“仆人眼里有伟人”的谚语。

第三是知识生产与文化有机性的分裂。知识生产变成了专业化的东西,有一套高难度的技术规范,其门槛被故意抬高,阅读的难度增加,能入门者甚少,越来越成象牙塔中的知识游戏和赛智表演,或仅仅只存在于某个“行内”,与社会、与文化的互动能力丧失,与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被割断。知识生产中个别领域的“文化”现象,掩盖了整个学术界脱离时代与社会的落后状况。

上述的三种分裂,即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了技术服务的对象,将学与术分裂,将知识与文分裂。这种“人为偏”、“渐趋于一极”的做法,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中说:“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人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假如论文写作不再美,不再有趣,与生活激流无关,甚至导致“人生必归于枯寂”,那么其危机将不再只是写作本身的事了。

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我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态度,缺少自律自律的学院派作风。社会的急迫需求和外在要求,或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主张,往往期待立竿见影、小成即显的效果,将近远期效果看作是全部目的而忽视了长期效果的预估预设,遂导致对技术思维的推崇,导致技术主义的流行。允许一定时期亦步亦趋的学习,允许一定时期的固守象牙塔,允许有一定规模的不食人间烟火之学院派,我们需有这种从容、气魄与气度,但是以此风气,蔓延开来则深深令人忧虑。当前的“技术至上”与后现代主义的瓦解历史、解构价值、诋毁崇高的思潮相结合,其所形成的思想偏执以至于靠“技术”支撑、“规范”行文而流行的“反着说”风气,这种以扰乱人们思想为目的的风尚则必须引起我们充分的警惕。

走向文学理论解释学

□蒋晓丽

文学理论如何解释,文学理论中的概念、命题、论断如何阐明,在什么样的思维层面上进行解释和阐明,这些是推动文学理论发展、推动文学理论综合创新的重要而关键的课题,需要建构起文学理论自身的解释学原则和解释学导向,使这种理论阐释由混乱走向清晰,由无序走向有序。可以说,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建构是当前文学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经阶段。马建辉的《走向文学理论解释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以下简称《走向》)正式出版了,当前学者们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的研究取向和切实努力。

《走向》全书共六章。第一章“解释与批判”主要阐明理论话语如何解释,这种解释应在何种思维层面展开,日常思维迷思对于理论解释的挑战,文学理论解释应确立的部分基本原则,体现出文学理论阐释价值与逻辑、历时与共时、“自转”和“公转”的对话性辩证法则。第二章“翻译与论争”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文本的释读为例,阐明了文本翻译、文本语境、学术论争对于阐释的意义和其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解释往往不是静态的,它存在于翻译活动、思维活动、对话活动、写作活动之中,在活动中把握文学理论的解释应成为阐释者的一种自觉。第三章“实践与探索”以文学意识形态论为中心,通过考察、探析一个文学基本理论范畴的对话性阐释之路,阐明解释最终是要落实到解释实践上的,解释原则则是从解释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同样它也要到解释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解释是一种对话和交流,渗透着一种批判和辩驳,一个概念的意义往往成长于学术论争的氛围。不可否认,一些概念是僵死的,一些概念则充满活力,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是否得到了

解释学情景中讨论双方的重视(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原因,甚至更重要的原因)。第四章“语境与现象”着重论述语境对于解释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力图从几个文学理论问题或现象出发,来呈现当前理论解释的处境。与语境和现象相比,解释是躲在后面的东西,或者说解释是被抽象之物。然而,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阐释学和阐释取向,对于语境和现象的关切无疑是一个必要的环节。第五章“个体与经验”通过对一些文学思想者的文学思想的整理与分析,阐释一个文学理论范畴与阐释一个文学思想者的文学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探索文学理论概念的个体意义与个体经验,以及这些个体意义与个体经验对于理解和解构的启示。概念是有其一般意义的,正是这一般意义才使概念成为概念。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个一般意义在个体那里并不是特别稳定的一种存在,而是具有迁延和变异的;而从作为概念的词语的意义的历史发展看,个体意义和个体经验往往是一个词语一般意义得到不断丰富和充实的重要推动力。第六章“文化与方向”力图阐明文学解释所承担的文化建构功能。解释也是一种文化行为。这一方面是说解释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氛围、文化实质、文化底蕴中;另一方面则是说解释还承担着文化建构的功能。本章重在强调后一方面。对于我国的文学理论解释而言,它必须有利于民族文化之健康而科学的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文化的发展是有方向的,我们的文化建构必须走在正确或科学的道路上,而文学理论的阐释活动在这方面也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走向》一方面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在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上也增

添了新的内蕴,是文学理论学科内涵建设的重要推进。《走向》的文学理论解释学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在理论思维层面剖开语言意义的方法。理论思维是一个整体,理论意义的生成是这些思维的产物,怎样思维就怎样生成意义。文学理论并不缺乏思想,缺乏的是理论思维层面的建树,所以那些没有理论自觉的文学思想实际上并不能称为理论,起码可以说不能称为真正理论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其次,《走向》为读者展现了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的部分生长点。这主要体现在后面的三章内容之中,它们分别涉及文学理论的话题境遇、个体境遇和文化境遇,文学理论不是封闭自足的体系,而是在纷繁杂乱的话题与思潮、歧异各异的主体以及大文化的氛围和主导取向中不断生成的。它是理论思维层面的,可它一刻也离不开日常思维,离不开日常生活,从日常思维到理论思维有着多样的中间环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反对日常思维,而是从日常思维中成长出理论思维,这显然需要一种自觉意识,《走向》给我们指出了探索的道路。再次,《走向》体现出了一份鲜明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它不是一种超脱的玄虚冥想,而是直面文学理论的时代问题,直面文学理论阐释方面的某些无序和错误状态。可以说,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建构是文学理论问题积累的必然要求,它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掉所有问题,但却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把钥匙或一种探讨的向度与姿态。对问题的探索是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走向》立足于文学理论中的诸多实际问题立题、立意、立论,必将有力推动人们对于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推进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走向》一书的出版,其意义或许就在此。

诗歌的心永远不会衰老

本报讯 诗人洪迪多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诗坛,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其诗学理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洪迪著有诗集、诗学专著、历史随笔

等十余种,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其诗集《超越存在》。近日,在洪迪80寿辰之时,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台州学院和台州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洪迪诗歌研讨会”,邵燕祥、唐晓渡、陈仲义等诗歌评论家与各地诗人、作家共5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上,与会者探索了洪迪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作经验,认真评论、分析了他的长诗《超越存在》《长江》等代表作品的艺术风格。大家认为,洪迪的诗歌创作包涵丰沛的文学意象,无论是立意的高远、哲思的厚重,还是想象的诡奇、语言的张力,都不失为当代中国诗歌的优秀作品。同时,他的诗学理论研究也独树一帜,他所提出的“大诗歌”理论和美学主张,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研讨会当晚,还举行了洪迪诗歌专场朗诵会。

(孙 侃)

把音乐的温暖带给孤独症儿童

本报讯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1月19日下午,“天使的微笑·希望的光芒”孤独症儿童音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由北京市残联、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以及北京星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联合主办的专场音乐会。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50多名“星星”孩子,用他们的音乐才华点燃了剧场内400多名观众的激情。这场为罹患孤独症的孩子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完全是公益的,参与的人员、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们,都

自愿义务地为孤独症儿童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主办方表示,用音乐打开患病儿童的心灵,是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有效的方法。音乐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次了解孤独症群体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孤独症孩子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尤其是音乐天赋的舞台。尊重生命、尊重差异,实现社会融合,是举办这台音乐会的期望。戴玉强、雷佳等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

(莹 莹)

中国仙鹤精神书画艺术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中国仙鹤精神书画艺术展日前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数十位书画家以及黄金元、余华嵘等将军书画家挥毫泼墨,为展览创作了多幅书画作品。《百鹤翔》《仙鹤精神》《沧海六鳌瞻气象 青天一鹤见精神》《晴天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扶摇雪羽舞青

霄,丹顶如灯红似潮》等书法作品,或铁画银钩、笔走龙蛇,或鸾翔凤翥、矫若惊龙;《和谐颂》母子情》《黄鹂归来是盛世》《洁身自好》《松寿延年》等美术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展览还展出了艺术家陈其旋提供的景泰蓝《和谐颂》天球瓶等艺术精品。据悉,展览结束后,展览主办单位将把参展作品编印成集,公开发行。(平 早)

本报讯 1月27日,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陈奕纯散文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高洪波、王巨才、白庚胜,以及周明、石英、阎纲、吴泰昌、柳娟、王宗仁、肖复兴、王彬、红孩、韩小蕙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作为画家、散文家的陈奕纯多年来一直在美术与文学两个艺术领域进行探索与耕耘。其创作的大型国画《盛世之歌》《国色天香》等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等单位收藏。其创作的散文《时间的同一个源头》《我吻天使的羽毛》《看着你一天天苍老》《月下狗声》等曾获全国冰心散文奖、徐霞客游记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奖项。出席研讨会的作家、评论家认为,陈奕纯的散文创作坚持从现实出发,把自己的感情命运同国家、民族的感情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散文作品积极向上、催人奋进,同时在写作技巧上充分发挥了美术家的语言优势,美术渗透着文学,文学提升着美术,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审美的共鸣,同时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审美感受。

(欣 闻)

陈奕纯散文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近日,由云南省文联主办、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承办的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届院展开幕式在云南昆明举行。

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是隶属于云南省文联的专业艺术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传承、培训、交流、发展、创作、弘扬美术书法艺术。同期举办的书画展览展出了姚钟华、钟开天、赵浩如等93位研究员的200余件作品,从多个方面描绘了云南特有的山川景观与民族风情,表达了艺术家们对美好生活 and 自然物象的礼赞与讴歌。展览集中展示了书画研究院的研究员们近年来的创作成果,体现了云南省目前书画艺术创作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对繁荣和发展云南书画创作、促进书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欣 闻)